

十三世紀華北地區的本地精英 網絡與蒙古帝國的管治

朱銘堅

香港大學中文學院

本文以《中州 劄》內二百通書信為中心，重構十三世紀金元過渡時期華北地區漢文人的書信網絡。本文首先呈現了北方不同地區的文人如何通過書信保持聯繫，認為最近有研究提出文人網絡在1234年金朝滅亡後已解體的說法值得商榷，進而探討忽必烈的庇蔭體系以及書信網絡中幾個主要的中介人，如何把部分文人網絡在1260年以後轉化為本土政治精英網絡，後者繼而促進了蒙古帝國在華北地區的管治。

關鍵詞：蒙古帝國 精英網絡 忽必烈 華北 書信研究

譜系重建與論學困境

——陳澧的調和論及其義理思想再探討

黃湛

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

道咸以降，盛極一時的考據學逐漸式微，受乾嘉考據學深刻影響的陳澧（1810-1882），生逢晚清學術轉型時期，其「漢宋調和論」最為人所知。然而陳澧的學說體系實以孔門四科為基本架構，相較漢學、宋學二元對立的說法，其學術視野更為寬闊。其所定義的「漢學」、「宋學」對應經學、理學，至於「考據」和「義理」，則是經學範疇內的概念。陳澧分別為經學和理學制定學術規範：經學方面通過考察歷代解經方法，梳理出孔子以降「考據以明理」的傳承脈絡；理學方面則延續顧炎武「經學即理學」的觀點，強調理學須以經書為依據，雖然其義理發明時與程朱理學牴牾。他調和兩者分歧的一個原因是出於糾正流弊、挽救學風的現實考慮。另一方面，清代考證學者在處理這一矛盾時，會做出避談義理、調和分歧等應對舉措，陳澧也有相應的表現。他對於經學—理學、漢學—宋學畛域的明確劃分，弱化了經學義理和程朱理學的分歧和衝突。

關鍵詞：陳澧 考證學 義理 漢宋調和 孔門四科

陳澧（1810—1881），字蘭甫，號東塾，晚清粵中大儒，以「漢宋調和論」為世所稱。錢穆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第十三章「陳東塾」最早詳加論析東塾學術。根據錢氏的研究，東塾主張大致如下：其一，所謂「調和漢宋」，主要是認為漢儒講義理，宋儒重讀書，批評門戶紛爭；其二，《東塾讀書記》要義在敘述群經重大問題，發明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義理，及闡述鄭玄、朱熹一脈相承的治學方法；其三，身處漢學衰頹之際，東塾「砥流俗，挽風氣，防弊杜漸」，¹其糾正時弊之方法主要是提倡讀書，特重漢唐注疏。此後研究東塾思想者不乏其人，大致都是圍繞東塾論學語，補充錢氏的基本觀點。本文希望結合東塾的治學特點和論學主張，揭示其學術理論架構的多重內涵，並且通過比較東塾與乾嘉學人，發掘其學說淵源和個人特點。

此外，以往研究多將晚清「漢宋調和論」等同於兼采考據、義理的治學方法，或者是對漢學、宋學的肯定態度。²但是，如果將「漢宋調和論」放在學術史的脈絡中看，就會發現實際情況更為複雜。因此，本文希望跳出漢、宋二元對立的傳統視角，對東塾學術及其調和論作一整體觀照，並由此考察乾嘉到晚清學術過渡的「內在理路」。³最後，分析東塾對宋儒理學態度和論學過程中面臨的困境，進一步給東塾的學術主張和特點做一歷史定位。

一、孔門四科框架中的「漢宋調和論」

東塾受教於廣州學海堂。學海堂由阮元建立，注重對學人經史小學方面的培養。⁴東塾一生致力經學考據，成果豐碩，而他批判

1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691。
2 如《清儒學案》謂：「道咸以來，儒者多知義理、考據二者不可偏廢，於是兼綜漢、宋學者不乏其人。」徐世昌等編：《清儒學案》第七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卷一七四，頁6945。
3 用「內在理路」的方法解釋清代學術史，最為人熟知的研究是余英時的《論戴震與章學誠》，該書用「內在理路」解釋了儒學從「尊德性」轉向「道問學」、由理學轉向考證學的過程。詳見余英時：《論戴震與章學誠——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，1996年）。
4 相關研究可參見容肇祖：《學海堂考》，《嶺南學報》第3卷第3、4期合刊（1934年6月），頁1-148。

和反思漢學、以及有關漢宋調和論的構建，出發點也是要對乾嘉經學、考據學作一番修正。正如錢穆所說，東塾「實欲因當時共尚之經學，轉移當時共尚之風氣」，⁵所謂「共尚之風氣」，即專以訓詁考據解經而少義理發明，東塾欲對此予以矯正。他說：

合數百年來學術之弊而細思之，若講宋學而不講漢學，則有如前明之空陋矣。若講漢學而不講宋學，則有如乾嘉以來之膚淺矣。沉漢、宋各有獨到之處，欲偏廢之，而勢有不能者。……道並行而不相悖也。⁶

又曰：

尋得漢儒真好處，則漢儒之學即聖賢之學矣。尋得宋儒真好處，則宋儒之道即聖賢之道矣。明儒之學宋儒，多學得宋儒不好處。本朝儒者學漢儒，又多學識漢儒不好處也。漢儒好處如何？曰純。宋儒好處如何？曰切。⁷

東塾指出，漢儒偏重經學，宋儒偏重道學，一「純」一「切」，一近古義、一述精微，均合乎聖人。他批評明、清兩代學人上承漢、宋學術，卻都轉入偏弊。明儒所學「宋儒不好處」，在空言義理而無考據；清儒所學「漢儒不好處」，在不能發明微言大義。有鑑於此，東塾意欲挽救漢宋學術之偏，使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。不過，儘管我們在東塾文集中經常看到他對考據學的批評，但正如前文所言，這種批評主要針對過分強調考據學、以考據代替經學而不講義理的偏失。其實，東塾本人十分推許乾嘉學者在經學方面的成就，

5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681。
6 陳澧著，楊壽昌整理：《陳蘭甫先生澧遺稿》，《嶺南學報》第2卷第3期（1932年6月），頁193。
7 陳澧著，黃國聲選錄：《東塾讀書論學札記》（選錄自嶺南大學圖書館藏《東塾遺稿》），陳澧著，黃國聲主編：《陳澧集》第二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381。